

主体的发生



The Genealogical Research on Subject

刘锡光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主体的发生



The Genealogical Research on Subject

刘锡光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主体的发生 / 刘锡光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308-14053-9

I. ①主… II. ①刘… III. ①主体—研究 IV.
①B0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5521 号

主体的发生

刘锡光 著

责任编辑	陈佩钰(yukin_chen@zju.edu.cn)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053-9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ss.tmall.com>



刘锡光(1930年2月2日—1991年9月10日),江苏常州人。父亲:刘天锡(铁路工程师);母亲:张静华(家庭妇女)。刘锡光先生是家中长子,另有五个弟弟。因为其父亲工作的性质和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小学和中学阶段经常更换学校。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毕业后留校,不久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1953年毕业后被教育部抽调到浙江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任校党委委员、教研室总支书记。1956年与人合作出版一本通俗哲学读物《《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后,他被开除党籍并撤销职务,在绍兴和安吉等地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劳动改造。1979年回到浙大哲学教研室,恢复教学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曾学习过英语、德语和日语。1991年9月10日去世。

序 言

本书是在刘锡光先生的一部遗稿和两篇未发表的论文(《主体哲学将应运而生》和《文化与生物,意识与语言,基因与进化》)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原本打算在2011年,他去世年二十年之际出版,但由于本人事务缠身,这项工作直到今年才告完成。遗稿原名为《主体哲学论纲》,30多万字,带有宏大的体系感,但是由于后一半的工作尚未展开,且多有语焉不详之处,为此不得不对这部分做大幅度的删减和压缩,基本保留了发生学方面的论述,因此书名也就相应改为《主体的发生》。

之所以要出版一本二十多年前写的书稿,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为了纪念一位长年执着于学术问题的探索,却没能留下印记的学者;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本至今依然具有学术价值,值得向读者推介的学术专著。

刘锡光先生1930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毕业后留校,同年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两年,毕业后被抽调到浙江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任校党委委员、教研室总支书记。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后,他被开除党籍并撤销职务,在绍兴和安吉等地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才回到浙大,恢复教学工作。从这时起到1991年去世,他真正的学术生涯也就是这十年,从讲师到副教授,一切都得重新开始。当然,这也是最开心的十年,他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讨论哲学问题了。在诸多哲学话题中,他选择了主体性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实践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作为一个经历十年“文革”浩劫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反思。在失去的所有一切中,最让人痛心的也许是人的主体性与尊严的沦丧。失去了自主的判断力,也就不必为任何乖戾

的行为承担责任,于是最终沦为任由意识形态操控的木偶。因此,改革开放必须首先复位人的主体性。

我是1985年进浙大任教后才与刘锡光先生相识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思维开阔、敏捷,但不善于表达。随着交流的深入,我发现他对待学术问题很纯粹,很少受功利驱使;当然也很顽固,要想劝说他放弃自己的观点是很难的。由于“文革”的十年断档,他和我们这些年轻教师之间没什么辈分的隔阂,他不时地为自己的一些想法所激动,拉着我们叙说,忘了时间,甚至忘了场合。在过于世俗的当下,回想起当年的情景大有恍若隔世之感。他教过的学生,有双学位的和研究生的,也都留有同样的记忆。他们也许忘了他说过什么,但肯定记得他说话的态度,那份童真和执着。

他的一位研究生孙周兴(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回忆自己的硕士导师时说过:“这回(1987年)之所以又报了浙大,原因却也简单,只是因为当时在刘再复先生的《性格组合论》一书前言中,读到 he 节录的‘远方的浙江大学的副教授刘锡光先生的一封信’,而后者在当年的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上列出了‘人类本体学’这样一个玄玄怪怪、莫名其妙的方向,着实吸引了我。”“后来的事实证明刘锡光先生确是一位怪异的、可敬的学者。盛年早逝的刘锡光先生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有一大堆手稿),主要是因为他的思想难得稳定,而总在变动过程中。另一个原因是,刘锡光先生在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一不小心做了‘右派’,之后近三十年时间里一直在田里乡间劳动改造(他居然也在我老家的一个采石场上被改造了几年!),不可能读书写作,结果是当他有机会写作时,他已经不能用清楚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了——虽然他经常有一些新鲜的、有意义的思想,而且也能够把这些思想口头传达出来。这是一位特别悲剧性的学者。”(孙周兴:《这个人在世纪末的仓皇》,载《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东方出版社,2001年)

我不知道刘锡光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人类学研究的,只知道他与来自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年轻教师廖平原一起讨论甚欢。只是他们关注问题的角度不同。刘锡光先生在意的的是一个哲学问题,即主体性是否具有人类发生学的基础。如果如他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就能够一改康德以来的哲学路径,主体性问题不再是纯粹的认识论问题,而更应该属于“人类本体学”问题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主体是一个双重属性的组合体,既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既具

有自然属性,也具有文化属性。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本体学”不同于传统的本体论研究,需要有一个经验的转向,或者说经验还原过程。经过转向,我们就可以摆脱抽象的理论思辨,用人类学和发生学考察所获得的经验性证据来直接论证自己的哲学观点。这个想法一直萦绕着他,他曾经为此兴奋,也曾经为此不安,于是不断找人讨论,哪怕得到对方一点点的肯定都能令他开心得手舞足蹈。但是,当时很少有人理解他的想法,包括我本人和一些杂志编辑。这一方面与他笨拙的表述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他的想法过于前卫了。我们知道,西方哲学界在认识论和本体论领域的自然主义转向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风靡起来的。人们开始尝试着用心理学、脑科学、神经科学,乃至人类学的经验性证据来谈论哲学问题。可以想象,如果他在世时能看到如此繁荣的景象该有多么兴奋。

前面,周兴提到的刘锡光先生给刘再复先生去信一事,表明他急切想在学界寻找知音。信是在看了刘再复先生在《文学评论》(1984年5月)发表的《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一文后寄出的。他在信中写道:“……你的人的二重性观点给我鼓舞,似有知音之感。粉碎了‘四人帮’后,我着手研究‘人’。我既不同意抽象的旧人性论,也不同意目前的无人哲学,认为大量的社会现象必须从人类自身的运动中得到答案。人是被说明的对象,但又是说明的根据。”刘再复先生在1985年出版的《性格组合论》一书的“自序”中评价道:“从刘锡光同志的来信中,我才知道他为研究人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的研究很扎实,而且从人类发生史的角度来说明人的本质及人的两重性,从人类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明人物性格二重组合,我在书中也涉及到,说明了人在自然面前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有支配自然的伟大性,又有被自然所支配的渺小性,但是由于我是人类发生学的门外汉,因此,无法深入。现在知道刘锡光同志在深入研究,自然感到欣喜。刘锡光同志已把人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来对待,这对于我国的人文学科发展是非常必要的,我祝愿他成功。”还记得他当时得到刘再复先生的回音后流露出来的那种由衷的喜悦之情,至今都令我为之动容。

我的一位同事陈大柔,也是刘锡光先生教授过的学生,他是这样评价他的老师的:“他在我的心中,不,在我们所有受教过他的人的心目中,刘老师无异于是思想大师。现如今我们学生中有大使、有教授、有官员、有企业家等,无不敬

服当年先生深邃的思想和耗尽一生心血做学问的精神。”他接着回忆道：“……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后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刘老师昏迷了几天,但我相信他临终前几分钟的意识是清醒的,因为虽已不能说话,可他在我怀抱中握着我的右手的手劲却大得出奇,像个年轻人。那一刻,我听懂了他的心思,明白了他的遗愿:我的书还没有出版,我的研究还没有完成,你们继续呀!”(陈大柔:《呼吸纯真·后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陈大柔的话也道出了我们这些学生和同事们的心声。不可思议的是,出版刘锡光先生的遗著一事恰恰是从一家婴儿奶粉知名企业——贝因美集团那里找到了新的动力。这家企业的高层包括谢宏、黄小强和俞祖勋都是刘锡光先生的学生和粉丝,有着强烈的意愿支持遗著的出版。董事局主席谢宏还捐出刚从省里获得的70万元奖金来资助出版事宜,并给浙大哲学系学生提供奖学金。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没有刘老师的哲学思想,我的事业就难以走到今天。”通过后来与他的接触,我知道此话绝非客套。一个设法用亲子文化来统摄婴童产业,在生、养、教中践行“体”与“用”的“哲商”,是完全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做”哲学的。

刘锡光先生的夫人许惠庆女士和女儿刘敏女士为遗著的出版提供了照片与简历,并在我们整理过程中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现在读者见到的这本书也是她们努力的结果。值得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部遗著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所能接触到的文献无法与现今比拟;另外,由于保存多年的遗稿多处字迹模糊,加上刘锡光先生的表述多有晦涩与跳跃之处,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了解刘锡光先生思想的核心,我们对篇幅做了压缩,对文字做了一些必要的修饰。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其中肯定存在不少纰漏,望请读者和刘锡光先生家属谅解。

但愿本书的出版能告慰刘锡光先生的亡灵。

盛晓明

2014年10月

目 录

导 言 / 1

第一章 主体的发生 / 13

第一节 主体的人类学特征 / 13

第二节 主体性特征的形成 / 19

第三节 古猿与前人 / 23

第四节 前人的生活方式 / 31

第五节 新石器时代的人 / 37

第六节 客体的发生 / 44

第二章 主体性与客体性 / 51

第一节 对象化与表象方式 / 51

第二节 主体的两重性 / 59

第三节 对象化与文化 / 67

第四节 人工物 / 71

第五节 客体的两重性 / 75

第三章 从言语到思维 / 79

第一节 语言是主体“之家” / 79

第二节 言说的神经生理基础 / 85

第三节 意义的构造 / 92

第四节 语言与思维的构成 / 100

第五节 生物与文化 / 108

第四章 认识的发生 / 116

第一节 认识能力 / 116

第二节 意识的构造功能 / 122

第三节 认识与世界的生成 / 130

第四节 时空观念的形成 / 136

第五节 表象的构造与数学 / 147

第五章 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 / 152

第一节 对象意识 / 152

第二节 自我意识的发生 / 159

第三节 自我意识与行为规范 / 165

第四节 审美意识的发生 / 170

第五节 对象与审美意识 / 175

第六节 美的理想 / 184

第六章 主体的价值的回归 / 193

第一节 需要与价值 / 193

第二节 价值的两重性 / 197

第三节 作为价值的自由 / 204

第四节 疏离化与回归 / 213

第五节 回归真、善、美 / 219

参考文献 / 225

索引 / 228

导 言

近代哲学,特别是当代哲学的研究总的来说是围绕主体和主体性问题展开的。那些不光否定形而上学而且还否定主体性问题的哲学,如现代经验主义和卡尔·波普所创导的“无主体的认识论”,其实也是从主体性构成的不同侧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相互的对立和否定不仅没有削弱整个主体性研究,相反地,在研究中,由于知识面的扩大及不断沟通,各派的观点在相互冲突中^①共同地丰富、深化了关于主体性的知识。

当我们谈论主体时就已蕴含两个前提。首先,主体已经与客体区分开来了,更明确地说,作为主体的人已经与作为客体的物质世界区分开来了。即便是在哲学的故乡,古希腊人尚未把自己看作认识客体的“主体”,他们同样也没有把外部事物“客体化”,从这个意思上说,他们还不是“主体”。在中世纪的哲学家那里,世界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它不是人的对象,因此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体”。“主体”是近代的产物。其次,只有当人把自己周围的世界作为认识或实践的对象,作为顺从或加以控制的对象来看待时,就意味着人对自己的本质和能力有过反思,并有了关于主体性的知识。所谓的主体性,也就是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的条件和规定,是反思的产物。

自近代以来,哲学家已经对主体性做过深入的反思,只不过他们总是设法把这些条件和规定看作是先天的、一成不变的前提。笛卡尔最先把心灵与物质世界区分开来,赋予心灵以思维的属性,标志着主体与自我的觉醒。笛卡尔认

^① M. 怀特在《分析的时代》中呼吁相互对立的像“刺猬”和“狐狸”一样的学派应该“重新统一起来”,“刺猬可以和狐狸同床共枕”,表达了绝大多数学者的愿望。其实,对立学派的见解是互补的,通过互补可以获得新的知识。

为,只有心灵会思考,物质不会思考;但是物质有广延,占据空间,心灵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就是所谓的二元论。主体是人的特征,是确定自由的基础。海德格尔指出,在笛卡尔及其随后的传统里,主体第一次获得了毫无疑问的确定性,是一切形而上学得以维持的“阿基米德点”。

不过,近代真正的主体哲学还是源自经验论者,到康德才宣告完成。他们的主体哲学仅限于认识论,与本体存在无关。因此主体性也就被看成是认识,包括知觉与思维的条件和规定。尽管康德在主体中区分了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和审美能力,并提供了一个包含真、善、美的主体哲学,但是由于与作为“物自体”的外部世界无关,这套完备的体系中看不中用,不具有改变世界的功能。

主体哲学的这种局限性到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才得到部分的克服。辩证法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从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统一的立场看问题;二是用历史演变而不是静态的眼光看问题。黑格尔把精神看作主体,和笛卡尔与康德不同,这种精神是能够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实体。也就是说,在主体中,思维与存在是统一的。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那个著名的命题:主体即实体,就表达了这个意思。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把人的实践或劳动理解为主体。劳动具有直接改造外部世界的力量,并且只有通过劳动,人才会觉醒,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从而把握了自己的命运。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留有 19 世纪德国哲学的思辨性通病,既抽象又晦涩。在他们之后,尤其到了 20 世纪,随着人类学的发展,我们对人类认知能力与劳动能力的演变拥有了更多具体的、实证的知识,仅靠思辨来论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学迄今为止所能提供的材料与证据都是有限的、零散的和不完整的。本书试图求助哲学论证,把这些零散的实证材料拼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图景,这就是本书所说的主体发生论。它的意图是通过历史发生论的研究寻找主体性。这种研究有助于各主要学派研究成果在主体性基础上的统一,从而有助于在纵横两个方向上完整地理解主体性问题。

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曾对“此在”及其“世界”的发生问题感到苦恼,这也影响了理论上的完整性。“从形式上把存在论询问同存在者方式状态上的研究划分开来这件事可能并不难,但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工作的进行,尤其是它的开端,却还不是易事。……如今人们认知了形形色色边边角角的文化

以及此在形式……但这只是假象。”^①他的老师胡塞尔就已经通过“超验哲学”实现对自明世界的提问,认识到了“主体性的谜是一切谜中之谜”。^②他认为,自然科学并不是“关于存有的最终科学,作为世界的‘客观性’‘是通过主观的创造活动所产生出来的存有,这是如此自明,以致任何一种其他的世界都根本不可思议的’”^③。也许这种成为悖论的自我,成为一切谜中最大的谜,“终有一天它将在经历了一切错误和混淆之后站出来作为任何真正的哲学的‘阿基米德点’”^④。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探索主体和主体性的历史发生,因此历史发生的澄清将成为确立主体性“阿基米德点”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仅仅依靠停留在逻辑数学运演水平的探索,以及个体发生的皮亚杰理论和纯粹实证主义的人类学是绝不可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花了好几十万字专门探索文明的起源。在他看来,“现代人、宇宙之谜,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的出发点”。他对“人类社会的首批代表出现”抱有极大神秘感。“是什么把大多数人类社会从沉睡中唤醒?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徘徊。”^⑤只是他没有有效的途径去解决它。美国社会生物学家 E. D. 威尔逊注意到了人的生物基因的独特性,从泰勒的文化决定论走向生物还原论,他并没有从作为主体的人的历史形成过程的特殊活动中理解生物基因功能的先天性和后天性的多重性,因而在生物功能的先天和后天的对立,在生命与文化的对立中苦恼地徘徊,在作为主体的生命基因的历史发生的早期(两三百百万年前)和晚期(一万多年前)的对立中徘徊。^⑥同样,美国人类学家基辛(R. Keesing)由于缺乏主体发生论,囿于传统的人类学,混淆了动物的后天习得和人的后天文化,因而在文化的界定上发生困难,最后无奈地说:“这个问题永远争论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⑦他认为,黎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64 页。海德格尔用“此在”取代“主体”这个概念是要否定把主体当作确定的、自明的这个传统,把主体当作研究的对象。(参见该书第 58 页)

②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 页。

③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第 116 页。

④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第 96 页。

⑤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 页。

⑥ 威尔逊:《论人的天性》,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2、75—83 页。

⑦ 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台湾巨流图书公司 1986 年版,第 94 页。

伯曼(R. Lieberman)、柯瑞林(E. S. Crelin)和他们的同事对直立人、尼罗德特人发声器官的研究实际上否定了原有的人类发生论,而他至少还坚持一些发生论的结论,诸如,“早期的人类可能发展出简单的手语”,“最早的语言形式可能并不是口语”^①。

至于国内近些年涌现出来的不少研究者,多少都受到摩尔根的人类发生论观念的影响,很难对主体的发生问题展开有效的理论探讨。他们通常认定,人类已有漫长古远的历史,描述中国远古史的人往往根据战国或战国后的文字记载而任意地猜想,说什么许多万年之前,中国人就有了自己的社会制度、婚姻制度、语言、图腾观念、道德观察、审美意识、科学知识等。其实在三千年前的商代甲骨文中还没有出现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和凤,作为中华民族共同崇奉的祖先轩辕帝至今没有证实,现已拥有的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和玉石时代的实物资料没有在这方面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依据。由此展开的关于人自身的探讨大多只能停留在有限经验的概述上,而且往往利用传统的概念如:理性、感性、个性、共性、自由、必然……即便使用主体和整体这样的新概念也是停留在康德的关于主体与客体分裂的现代性理论框架中。中国理论界已经有了人的自觉,但作为主体的自觉现在才开始。理论界要想完成主体的自觉,除了吸取作为全人类知识财富的当代各哲学流派和经验科学之外,还须在主体发生论上有所突破。

本书不是想构筑一部有关主体发生的经验知识的百科全书,而是想通过对经验事实的新的理解进而赋予经验科学以形而上学的基础。胡塞尔、海德格尔继康德之后极大地改进并丰富了经验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我们的工作并没有脱离这个方向。

社会进入了后工业社会,知识也出现了后科学的知识。所谓后科学的知识肯定是与主体性相关的,与近代的知识概念不同,后科学的知识首先是通过主体的参与形成的。这就打破了客观性概念带给我们的方法论教条,即在观察中撇除主体的干扰,保持价值上的“中立”。其次,更重要的是,知识是以主体的对象化,或者说物化形式出现的。从新石器时代至今就出现了各种形态的知识,近代以来的经验知识,它的形态并不是永恒的。同样,科学也不等于真理,真理

^① 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第89—91页。

还可以以新的形态出现。无疑,作为一种特定的知识形态,科学将继续下去,但其中将出现一些新因素,这些因素集中到一点就是,知识将以主体性形态出现。也就是说,人们的关注点将从对象回归到自身,进一步从主体自身寻找世界的本原。科学经验的外在部分将继续面向对象探索,决不会削弱,但科学经验的内在部分将向自身探求,后者的探求中心就是主体性。

如今,世界上各学科有远见的学者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主体性的反思作为一种学术取向已呈现出不可逆转之势。无论是康德的知识论还是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都是从不同角度去探寻主体性。库恩以来的科学哲学家,他们的贡献集中到一点也是为科学奠立新的主体性哲学的基础。这种努力才刚刚起步,当人们最终理解了主体及其世界的发生,并使现有知识体系与主体及其世界的发生学的图式相一致时,才有可能从目前的纷乱、对立的状态中走向新的主体性的统一,从而进一步推动知识进步。

本书有三个基本的线索,它们贯穿全书内容:

第一,本书的核心概念是主体、主体性或主体对象化,其他一切概念、范畴都由此派生出来。一开头的发生论就贯彻了主体性。本书对古人类学资料的运用,不是着眼于各种文化遗存的外在形态和加工度,而是着眼于它们所体现的主体的对象化功能。对意识的考察不是着眼于它与存在的关系,而是着眼于主体的外化和参与性。对客体的考察不是着眼于自在存在,而是着眼于为我的性质,因而也就重新解释了物质的实在性。对价值关系的考察不是着眼于它与事实的关系,而是着眼于主体对象化所引起的与客体的关系,这样一来,事实 and 价值的同一性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对真、善、美的审视和界定不着眼于定义和归纳,而着眼于主体的生命需要及其价值取向,三者的矛盾关系一经赋予主体对象化内容,便能生动地呈现出来。争论了近百年的文化概念,由于充实了主体性的内涵才具备了人化性质的系统性,不仅同前文化相区别,也同其他任意选择的文化概念相区别。语言由于具有对象化的规定,才明确了它的属人的性质,与前人和儿童语言区别开来。人类历史的概念也正是通过对象化的规定,区分出了非主体的童年史和成年的主体史,从而发现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人(即主体)的历史其实并不长。

总之,人作为主体存在,它通过对象化构造了一个与自在存在相区别的人

化世界。这个世界范围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它不仅通过劳动加工对象，构造一个人直接生活的世界，而且通过主体自身的参与构造出了诸多可能的世界，即把更多可能的存在纳入自己不断扩展的生存体系中来。

主体的对象化所形成的世界有两种存在形态，一是作为客体的外部“文化”，二是作为主体的内部“文化”（包括心理的、观念的内容）。人通过对象化实现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双向文化，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人化世界。文化就是主体的对象化，因而就是人化。

第二，本书立足于人类发生论，包括主体对象化这个基本特征也来自发生论。主体对象化和主体发生论其实是互为前提的，这似乎构成了一个循环解释。循环解释在逻辑学上是不允许的，但是在历史与现实的生活却无处不在，因此，我们在方法上更应该尊重历史与现实，通过实证的材料去再现历史的进程。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主体不只是反思性的产物，它具有自身的本体论基础。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主体也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人类，至少不能等同于当今人类学家所理解的人类，主体具有自身特殊的生物学条件和功能。正如弗兰克林所说：“如果假定人是动物的后裔，那么，为了证实这个理论，我们就必须发现猿和人、自然……之间的‘缺少的环节’。”^①寻找缺少的环节首先是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任务，但形而上学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目前人类学发掘出来的资料或证据虽然尚不充分，但是相比之下消化这些资料的工作更落后。在现有资料基础上检讨传统的人类学概念，从而确立新的人类学概念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本书认为，七八百万年前开始的前石器时代的人科系列成员尚不具备外化的功能，因此属于“非主体”（non-subject）。大体上说，三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才进入人类的童年期，由于成员具有工具外化功能，我称之为“前主体”（pre-subject）。旧石器时代作为成年人类的形成期，才是我们所要寻找的人与动物之间的“缺少的环节。”新旧石器时代之交出现的成年人类因具有对象化功能，我称之为“主体”（subject），这也正是如今人们从自我出发所理解的人。与之相

① 弗兰克林：《科学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 页。

应的对象概念则分别是“非客体”(non-object)、“前客体”(pre-object)和“客体”(object)。

依据功能区分物种的原则是用以确定历史发生论的依据之一。外化和非外化,体现物种演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功能。但是在外化功能中,工具外化和对象化之间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工具外化是指借助工具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动物行为学家早已告诉我们,猩猩就具有这种功能。对象化则不同,它是指人按自己的要求与想法去改造对象。对象化的功能无疑对人的主体性提出了要求,他首先要有能力反思自己究竟有什么想法,还要弄清到底有无能力去实现自己的想法。这两种不同功能之间的区分究竟有没有生物基因上的差异为基础的呢?迄今为止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学者们通常会不顾这一点,任意地扩大历史的同一,而忽视这种功能差异所内含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这样一种流行的做法显然阻碍了人类学家去发掘基于生物学的不同功能,以及不同功能在基因层次上的差异。

第三,主体的存在系统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定。属人的世界,或者说人化的世界不再是自在世界,而是主体参与构造的世界。这个世界既包括作为生存资料的对象,包括现实的、非想象的自然界,当然也包括参与世界而生成的人自身。人与自然的对立是以主体参与客体而形成的统一关系为前提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主体的存在系统。这个世界同作为主体的人类共存亡。传统观念把主体规定的世界、主体参与生成的文化世界,也即经验世界,看作是自在存在,独立于主体的外在,这是历史的误解。因此在本系统中,主体性、世界、文化、价值、人类本体等概念是具有相同内涵的不同表达。

这个现实世界的历史并不长,它经历了旧石器时代几百万年的准备,大约在一万多年前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而诞生。这个世界的空间范围以主体对象化为半径,随主体对象化活动的展开而扩展。了解这个现实世界,并从这个现实世界出发,科学研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类学)才能有所成就。如果把主体经验规定的世界作为既成的存在,研究就容易迷失方向。

由此可见,主体性问题既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又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从历史上看,这是两个壁垒分明的领域。形而上学家大都无视具体的经验事实,而经验主义者,如维也纳学派通常会抵制形而上学。在方法上,本书试图借